

二十世纪名人大事纪实

外交斗智

策划 空堂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中国人在东京法庭审判战犯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晤莫斯科
万隆会议的谋杀阴影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人大事纪实

外交与智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外交斗智人物

主编：康捷 魏兵 柳霜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一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4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05-182-1/I·149

定价：17.60元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 划	空 堂				
总集编	康 捷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副主编	李锦峰	杨 波	吕允丽	刘 路	
	郭兴文	李向晨			

编 委	齐相潼	范新坤	杨 勇	李亚新	
	庞 烜	陈 青	田和平	陈 凡	
	胡良骅	李 晓	邵之茜	尚志明	
	荆三隆	徐 艺	于希民	刘应安	
	陈克勤	牛 恺	金 平	王新民	
	欧阳妙玉				

目 录

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彭 明 (1)
中国人在东京法庭审战犯	方进玉 (20)
期大林与毛泽东会晤莫斯科	〔苏〕费德林 (35)
周恩来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活动	李明 刘强 (49)
总理要让他干外交	孙耀声 崔景山 (86)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隐形巨人”	简 妮 (105)
日内瓦会议的上层内幕	师 哲 (133)
万隆会议的谋杀阴影	尹家民 (158)
举世瞩目的“九人案”	东 生 (206)
乒乓外交始末	钱 江 (254)
美国与中国：外交大跃进	〔美〕迈克尔·汉德尔 (311)
中日建交过程纪实	李明 刘强 (364)
文革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加〕柯 让 (408)
海湾战火中的中国外交官	云 水 (442)
外国要人在钓鱼台	钮 明 (469)

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 和会上的失败

●彭 明

从克林德碑说起

走进中山公园的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头牌坊，白（大理石）身蓝（琉璃瓦）顶，上面还雕刻着飞禽走兽，很是威风。这就是最早的克林德碑。这座碑，原先在东单牌楼的北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迁到这里，改为“公理战胜”碑；全国解放后，又改为“保卫和平”碑，郭沫若亲书的这四个金色大字，现在仍闪闪发光。

克林德碑是怎样树起来的？又是怎样迁到中山公园的？

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他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丧命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展开了反帝国主义的义

和团运动；而西太后（慈禧）掌权的清政府，在废存光绪皇帝的问题上，和帝国主义一度产生矛盾（西太后立大阿哥溥仪，准备庚子年登位，被驻京公使拒绝），因而利用义和团的民气，对外宣战。清政府在宣战的时候，还鼓励捕捉洋人：“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则赏银五十两，女则四十两，幼则三十两”。在这种政策下，恰巧德公使克林德坐轿往总署，经过东单北边，被企图领赏银的满洲兵丁枪杀，这一事件，成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清政府彻底投降帝国主义，1901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和约》，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被杀赔礼道歉的事。《和约》写道：

“第一款，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林德）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根据以上条文，第一赔礼道歉，第二竖立牌坊，已经规定的相当清楚了。不过，就是在这一款的谈判中，还相当费周折呢！参予此事的赛金花，在晚年的时候，曾作过一番丑表功的忆述，她说在谈判过程中，克林德夫人是执拗的，经过她的劝

说，才解决了问题。她是怎样劝说的呢？先是把罪责推到义和团身上，然后提出了建立牌坊的办法，她向克林德的老婆说：“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都是竖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是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是皇上给他赔了罪了。”经过赛金花的劝说，克林德的老婆算是同意了，赛在叙述这段历史后，洋洋得意地说：“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喜欢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赛金花认为是光荣，实际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因为这是中国战败、中国的反帝运动被镇压下去的记录。中国人每当走到这座石牌坊（当时北京人通称克林德碑为“石头牌坊”）下的时候，怀念的并不是克林德，而是那些被杀害的义和团团员和广大无辜的北京市民们。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德国被打败、和协约国签订休战条约的时候，这座牌坊便从克林德被杀害的地方（东单北）迁到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当时叫中央公园），牌坊的名字，也改成了“公理战胜”。

除克林德碑的搬迁和改动外，为了庆祝欧战协约国的胜利，北京政府还以参战资格在北京举行了三日大庆（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在故宫内的太和殿前还举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阅兵典礼，所有在京的北洋军都参加受检，由大总统徐世昌率领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官员检阅，并请各国公使等参加观礼。检阅后，又共同至中南海总统府举行宴会，绿酒红灯，轻歌曼

舞，好不热闹。

其实，中国并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欧战（只是派了些华工到欧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所以，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对北京政府的这种虚假的光荣，并不觉得值得祝贺；对于中国虽有战胜国的虚名，但能否和战胜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挽回失去的利权，表示忧虑。因此，有人作诗对北京政府的庆祝加以讽刺说：

自家面目自家知，
粉饰徒能炫一时；
漫说邻家西子色，
效颦总不掩东施。

公理战胜？

除官方的庆祝外，民间也举行了庆祝。例如，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京中各学校便于11月14—16日，连续放假三天，庆祝胜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特别是东交民巷和天安门一带，拥挤不堪，一片欢腾。15、16两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讲演大会。同月28—30日，北京各学校又放假三天，更大规模地参加了北京各界的庆祝大会。这三天的每天下午，北京大学都在中央公园举办讲演会，讲演者不仅有教职员，而且有学生。

民间的庆祝和官方的庆祝不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已经把欧战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考察

了。李大钊在演说中指出：“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接着，他又分析了这次大战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结果，“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指资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因此，他指出这次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蔡元培在天安门的演说，有两次，15日的讲题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6日的讲题是《劳工神圣》。他虽然在前一讲题中宣传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但在后一讲题中却赞扬了“在法国的15万华工”，并且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在讲演会上，有一个北大法科的学生，也赞扬了“华工”。他说：“不知一人之力，力虽小，合为群力，其力大也。如15万之华工，当彼等在本土之时，丝毫无足轻重，且常为旧官僚派所贱视，乃赴欧也，竟致协约国获最后之胜利，于以知华工虽少，其功实不在协约国以下。”这一段话，对华工所起的作用，估计是否恰当，另作别论，但从这里可以看到青年们开始对工人阶级和群众力量的重视。

北大校长（蔡元培）讲演《劳工神圣》，学生充分估计工人

的伟大作用。很显然，这都是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是为欧战胜利发表演说，李大钊看到的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军国主义的失败；而胡适宣扬的则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吹嘘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所谓和平 14 条，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国的幻想。

胡适在演说中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如今且说美大总统所主张，协商各国所同声赞成的‘解决武力’的办法是什么？”即：“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胡适在这里宣扬的“解决武力”的办法，即美国总统威尔逊于 1918 年 1 月 8 日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所提出的 14 条。

在其第一条中，虽然在形式上提出反对秘密条约的字样，但实际上是为了扩张美国霸权。因为，这一条在当时的意义，只是反对了那些没有美国参加并妨碍美国扩张计划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秘约。

在其第二条中，虽然提出了“航海自由”的口号，但其目的，是在于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以便美国取而代之。

在其第三条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再一次宣扬“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其目的是借各国在战后精疲力竭之际，使美国控制世界市场。

在其第四条中，提出所谓缩军问题，其目的在于解除美国对手的武装。

在其第五条中，提出“公道”地解决殖民地问题的虚伪口号，而在实际上，是美国要求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变为

自己的殖民地。

在其第十四条中，提出了国际联盟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动员国际反动派的一切力量在美国统率之下，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和世界革命的活动。

威尔逊 14 条的实质，时间过得愈久，暴露的也愈加清楚。但是，它在当时确实迷惑了很多。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1918 年 12 月）中，就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既然陈独秀都这么说，那么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就更多了。11 月 30 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门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1919 年 1 月，巴黎和会开幕，社会各界舆论中就充满了更多的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上海《民国日报》在 1919 年 1 月 5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欧战的胜利说成是“协约国及美国之大战成功”，说这次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一个作者在一篇题名为《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一文中，不仅幻想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会成功，而且预卜和会讨论范围之外，中国还能够获得许多根本利益（如“军武势力之消灭”、“海外移民之发展”、“道德基础之稳定”等。认为中国从此会来一个大翻身。这实在是太天真了！

梁启超当时写了《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和平而战也。”他认为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并说：“吾国人热望此同盟之成立，几于举国一致。此吾所敢断言也。

此同盟最要之保证条件，即在限制军备。故吾谓我国为表示此热望之真诚起见，宜率先厉行裁兵。盖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借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

梁启超在这里替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大肆宣扬了一番，断言中国“举国一致”，“热望此同盟之成立”，并认为天下从此没有侵略主义了。梁的这番和平主义的散布，毫无疑问，又加重了人民群众中原有的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除了上述这种突出的和平主义论调外，当时的许多群众团体也曾经企图联合起来，向巴黎和会表示人民的愿望，给和会以影响，使其实现中国独立的要求。例如，留日学生救国团曾提议组织赴欧公诉团；国民对日外交后援会决议派代表赴欧；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团体曾组织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并联合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各省商会，共同向巴黎和会提出要求。

尽管这些群众团体显示了必须以群众力量来影响和会的意愿，但是，它们对和会充满幻想，这又是和上述那种论调共同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意见书中说：“兹值战局告终，和会开幕，强权失败，公理昌明。正我国人仰首伸眉，理直气壮，求公判于世界各国之会”。

“公理战胜，强权失败”，这简直成了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这一句话。克林德碑由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上面大书的也是“公理战胜”这四个字。

公理战胜了！公理战胜了！

但是，公理果然战胜了吗？

请看事实的回答。

分赃会议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战胜的协约各国忙碌起来了。它们纷纷拟定各种瓜分世界的蓝图和许多具体方案，准备到巴黎去开“和会”。所谓和会者，分赃会之别名也。

美国这个后起的但是颇为急进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就想和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平分秋色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它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它在伪善的 14 条掩护之下，一方面高唱“国际联盟”以便成为战后的“盟主”，来达到镇压世界革命运动和巩固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目的；一方面积极地排除一些和自己争夺霸权的异己势力，具体地扩大在殖民地中的侵略。

中国是美日争夺的焦点。因此，怎样排除日本在华势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是美国所处心积虑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国内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逐步高涨起来。美国认为，必须利用中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来打击日本的势力。1918 年 9 月 4 日，徐世昌担任大总统，威尔逊在 10 月 10 日致徐的贺电中，便要求停止内战、南北统一，认为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会议中占有地位。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广州的美国领事分别在北京和在南方的军政府中积极活动。

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不肯让美国来争夺自己的霸权，但是在世界一片和平声浪中，又不能坚持中国的内战政策，于是它提出应该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向南北政府提出劝告和平统一，而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提出。日本政府这个建议是在 10 月 23 日提出的，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12 月 2

日，北京的五国公使赴总统府，驻广州的五国领事赴军政府，提出同样的和平统一劝告，并假惺惺地说：“关于中国解决内讧之办法，五国政府无何等干涉之企图，亦不指示何等妥协之条件，或左右之意志，全由中国人士自己协定之。”

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南北实行了“停战”（北方政府的停战令是11月16日发布的，南方政府的停战令是11月22日发布的）。

1919年2月20日，所谓南北和会正式在上海开幕。

帝国主义说：“无何等干涉之企图”，只能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南北和会上的斗争，事实上是反映了亲美派和亲日派争夺权力的斗争。正因为美日矛盾的不可调和，南北和会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

当国内的南北军阀、政客们为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的时候，国际上一个更大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正在进行着。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18日于巴黎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幕的（最高会议议场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

参加巴黎和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20多个国家。

参加和会的虽然有20多个国家，但实际上，是美、英、法、意、日五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三个国家，操纵着会议，和会最初成立一个“十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各国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日本的两个特别代表组成），后来又成立了“四人会议”（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和“五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四国外长和日本代表组成）。

“四人会议”是和会的决策机构，意大利的作用不如美、英、

法，后来又因为本国要求未能达到而中途退出了会议，所以，实际上是美、英、法在那里操纵着会议。一切重大问题，皆由它们决定，其他国家只是在讨论到和其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列席。

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原为陆征祥（外长，1918年12月1日赴欧）、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后在美国等驻京公使的要求下，加派王正廷（原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为代表，以示南北统一。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王正廷名列第二。陆为历次与日本签订密约有关之人，而代表团中英美派居多，所以陆到巴黎后不久，便于2月10日提出辞呈，未准，旋又称病于3月间赴瑞士，至4月五日始返巴黎。因此，列席最高会议的经常是顾维钧、王正廷2人。

中国代表团最初向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有七：

- 一、废弃势力范围；
- 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 五、归还租借地；
- 六、归还租界；
- 七、关税自由权；

原来拟定的提案中还有“铁路统一”的项目，后因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的积极反对，（曹说如果实现此项，必陷入英美之阴谋），遂删除。

中国留欧学生对巴黎和会予以密切注意，并结成团体，派出代表，要求中国的外交代表必须向和会提出废除21条。在此情势下，中国代表团遂又提出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

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

但是，以上两项提案在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都遭到拒绝，认为不在和会讨论之列。和会议长克里孟梭在复中国代表的函中说：“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

既然两项提案均遭拒绝，那么唯一的希望就在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了。

1月27日，“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

在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他种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日本代表并发表了1917年初英、法、俄、意、日五国签订的秘密谅解，即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

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竟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中了，因此，当日本代表提出上述宣言后，他们感到很狼狈，只好说希望等中国代表申诉理由后，再行讨论。

第一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就这样结束了。

1月28日，又开“五人会议”。中国代表列席申诉理由，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日本代表继起发言，说胶州湾已在事实上成为日本之领属，并说：“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等等。中国代表接着发言，说中日间的密约，中国系被迫而订，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该由